

中国当代哲学回顾与展望^{*}

陶 德 麟

我试图按我个人的理解,对中国大陆哲学的现状作一极粗略的介绍,并对它的前景谈一些看法。除特别注明的处所外,下文说到的当代中国哲学均指当代中国大陆的哲学。

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哲学的状况取决于诸多复杂的因素。就单个哲学家的学说来说,甚至他个人的经历、教养和气质都是形成他的学说的不可忽视的因素。但若就某一时代、某一民族或某一国度的哲学总体状况来说,最主要的决定因素还是两种:一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状况,二是已有的思想资料、特别是哲学传统。要理解今日中国哲学的状况并推断它的前景,不能不涉及这两种因素。本文侧重在后一因素的分析,对前一因素只拟在必要时附带提到。

一

中国哲学的源远流长是人所熟知的。殷周时期就有了哲学思维的萌芽。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百家争鸣”的局面与古希腊罗马的学术繁荣的盛况东西辉映。秦、汉以后,中国建立了长达两千多年的大一统的政治格局。这中间虽然有战乱,有外患,有分裂,但总的趋势和持久的形态是大一统的格局。准确些说,是政治上高度中央集权与经济上高度分散的统一。近代以前中国的多种思想体系,当然也包括哲学在内,都是在这种格局的孕育中形成和发展的,都带有这种格局的印记和特征。

中国哲学内容的宏富也是举世闻名的。它以独特的范畴系统和命题系统研究了西方哲学所涉及的几乎所有领域,如本体论、认识论、方法论、历史观、逻辑等等。中国哲学中的天人关系、道器关系、理气关系、有无关系、变常关系、一多关系、动静关系、神形关系、体用关系、名实关系、行知关系等等,无不涉及上述各个领域。而且,同西方哲学一样,在这些问题上也是流派纷呈,有斗争,有融合,构成了色彩斑斓的画面。

从一定的意义说,并没有统一的“中国哲学”。因为中国哲学的流派极多,其中影响最大的就有儒、道、释三派,特别是儒、道两派。而各派之中又有许多支派,在观点上歧异很大。同一派的先行者和后继者也有很大的歧异。例如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死后,他的后继人就分成了许多派,其中影响最大的是“思孟学派”和荀子学派,许多观点都是针锋相对的。儒家学说经过汉代

* 本文是作者1994年4月6日在美国爱荷华(Iowa)大学的讲演。

的董仲舒和宋代的朱熹的两次系统改造之后，与孔子本人当时的思想也有很大的不同。这是一方面。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各派哲学又是在共同的经济、政治、文化土壤上生长起来的，它们对问题的观点虽然歧异极大，但它们关注的问题本身却大致相同，它们研究问题的旨趣或目的，它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也大致相同。这就形成了中国哲学的精神，正如西方古希腊哲学尽管也流派纷繁，但都有共同的希腊精神一样。而本文关注的正是中国哲学的共同精神。

中国哲学的共同精神，用最简略的话来概括，我以为就是“内圣外王之道”。“内圣”，指的是个人的内在修养，精神境界。中国哲学要求个人在人格修养方面努力达到圣人的境界。“外王”，指的是以圣人的品格从事实践活动，使国家建立理想的秩序，使人们安居乐业，各得其所。这个精神在儒家哲学里体现得最明显。被宋代朱熹系统化了的儒学奉为经典的《四书》，通体都贯穿着这种精神。特别是其中的《大学》更以极鲜明的语言表达了这种精神。《大学》开宗明义便说：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新）民，在止于至善。

朱熹认为这三条是《大学》的“纲领”。

又说：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知致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朱熹认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条，是《大学》的“条目”。

这八条中，最根本的是“修身”。“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为了修身，是提高个人精神境界的工夫。但修身不是目的，目的是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把个人的修养付诸社会实践，把理想现实化的工夫。这就把“内圣外王”的意思诠释得极为清楚了。

从表面上看，似乎这只是儒家一派的精神，不足以代表整个中国哲学的精神。其实不然。比如道家，好像是与这种精神相反的。老子是反对“圣人”的，甚至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但他的全套主张还是要把个人修养成“圣人”，只不过“圣人”的标准与儒家的不同而已。他主张“无为”，好象不问“治国平天下”之事，实际上他是“无为而无不为”，考虑的正是如何治国平天下人事。他治国平天下的理想是恢复到“结绳而治”、“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的太古时代。他的方略就是要“绝圣弃智”，因为“民之难治，以其智多”，所以“圣人之治，常使民无知无欲”。所以他也还是从个人的塑造开始，达到实现治国平天下的目的。其他各派，也可以作如是观。把“内圣外王”作为中国哲学的共同精神来把握，我想是比较恰当的。

中国哲学的这种共同精神又派生出几个特点：

第一，重政治。

中国哲学并非不谈自然，但谈自然也是为了“究天人之际”，为了给人世的理想秩序找出“天上”的依据，最终还是为了解决人世的问题。董仲舒的以阴阳五行为框架的汉代神学经学是最典型的例子。中国的哲学绝少有西方那样的纯哲学，绝少有象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和康德的三《批判》那样的专门的哲学著作。中国哲学几乎总是同政治主张揉合在一起，并以政治主张为归宿。中国也绝少有不问政治的哲学家。相反，绝大多数哲学家是官员，或者是想做官员而不得、因而抱恨终天的。这不是由于他们贪图功名利禄，而是由于他们认为只有自己掌握了政治权力才能实现“内圣外王”的宗旨，才能行自己的“道”。孔子一生只做过小官，但他总想做

大官。“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沽之哉！沽之哉！我待价者也。”“道不行，乘桴浮于海。”“盛矣吾衰矣，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表现了他从政行道的急切心情。孟子的遍千诸侯，亦为此目的。中国哲学可以说是一种政治哲学。

第二，重实行。

中国哲学与政治密不可分，必然贯串着重实行的精神。例如讲性命天理，是为了修身，而修身又是为了治国平天下，落脚仍是政治的实践。所以中国哲学较少精密的思辨与论证，而直陈命题的情况居多。这中间有许多天才的智慧，但缺乏细密的论证。比如讲认识论，就没有象洛克、莱布尼茨、休谟那样专门著作中那样细密的论证。

第三，重综合。

中国哲学没有经过西方从16世纪至18世纪自然科学的洗礼，没有受过哥白尼、伽利略、刻卜勒和牛顿的方法的影响，因而也没有西方近代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的传统。毋宁说，中国哲学始终是沿着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思维方式向前发展的。它注重从整体上、宏观上、联系上把握事物，而极少用“原子论”分析方法。这自然使中国哲学在细节上远不如西方近代哲学精密，但是在总体的把握上它却避免了“原子论”方法的孤立性和片面性的弊病。

第四，重群体。

中国哲学注重个人修养，以个人的修身为本，在这一点上是极重视个人的。但这种重视个人，是为了把个人修养成为服从群体目的力量，是为了“克己复礼”，“存天理，去人欲”，最后达到治国平天下。这与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个人主义的个性解放是完全不同的。这当然有压抑个性的极大弊病。但是，这正好说明中国哲学非常重视群众的力量。中国哲学家和政治家几乎都看到最终决定局势的不是个人（即使是“圣人”），而是群众。中国古代就有“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民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民犹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说法。孟子甚至主张对纣王这样的“一夫”，杀了也不算“弑君”。孔子则把“泛爱众”，“修己以安百姓”作为最高的行为典范。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哲学一大特点和优点。

二

到了近代，世界资本主义列强的炮火打开了古老的封建中国的大门，引起了中国经济、政治状况的剧烈的深刻的变化，使中国濒于亡国的危险。两千多年一脉相承的中国传统文化，连同它的哲学，就其固有的内容来说已无法挽救民族的危亡，更不用说“治国平天下”了。在国粹不能保国的现实威胁下，先进的中国人努力学习西方。不但学西方的技术，也学西方的文化。于是“西学”被引进了中国，而这又造成了中国文化领域的大碰撞，大激荡。到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终于形成了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总批判的大趋势。那时传入中国的哲学，一方面是西方资产阶级的各种流派，主要是实用主义和实在论，一方面是马克思主义。大家知道，经过大约30年的历程，马克思主义理论，包括它的哲学，在中国大陆取得了主导地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已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要了解中国当代哲学的状况，就不能不承认这一事实。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什么会成为当代中国哲学的主流，有诸多复杂的原因，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原因。分析这些原因不是本文的任务。我在这里只想从哲学本身的特点说明一下：这样一种产生于19世纪的西欧、与中国的文化背景完全不同的哲学，竟然为饱受中国哲学两千多年传统薰陶的中国人所接受，是如何可能的。

作为民族精神的精华，哲学是渗入民族灵魂和血肉的东西，是不能以引进自然科学和技术

那样的方式从外国“引进”的。它必须与本民族固有的哲学传统相嫁接、相同化、相融合，才可能为本民族所接受，在本民族的土壤里存活。而某种外来的哲学思想要能与本民族的哲学传统嫁接、同化、融合，又有赖于两者之间有契合之处。否则，就会出现类似把某种血型的血液输进具有不相容的人体的结果。马克思主义哲学这种看来好像与中国传统哲学冰炭不相容的哲学居然能在中国土壤里存活生长，就因为这两者之间在很深的层次上有可以契合之处。要理解这种可以契合之处，我以为需要澄清两个问题：

第一，应该把某种哲学本身与持这种哲学观点的人在某种特殊条件下作出的实际结论加以区别。这两者的联系虽然不可否认，但这种联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马克思主义在经济和政治问题上的结论确与中国传统哲学指导下推出的结论截然不同，但这并不影响这两种哲学之间有许多深层的共同点。正如黑格尔的政治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说虽然不同，但他们的哲学却有许多共同之点一样。

第二，应该把某种哲学的具体观点与这种哲学的方法加以区别。两种哲学的具体观点尽管完全不同，表现为相反的命题，但使用的方法却可能相同或相通。例如黑格尔的哲学与马克思的哲学的关系就是如此。

从这样的视角看，中国传统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之间就有许多共同点或相似点。例如，两者都自觉而公开地把实现政治理想作为使命。中国哲学的使命是“治国平天下”，是“为万世开太平”，是实现“大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使命是“解放全人类”。两者都注重实践，强调实行。两者都重视改造主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的关系。两者都重视群体的力量。两者都偏重于整体的、联系的思维方法，即辩证的方法，等等。

中国人认识到这一点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初，反对者和拥护者都看不到这一点。反对者因拒斥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结论和具体的哲学命题而全盘拒斥马克思主义哲学。拥护者则全盘摒弃中国传统哲学，认为全是糟粕。反对者是一直坚持反对态度的。而拥护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则因为在实践中碰壁而终于醒悟，从“打倒孔家店”的幼稚口号中走了出来。他们逐步认识到，民族传统是不可能用“打倒”的简单办法一笔勾销的。无视传统，企图原封不动地“搬”进某种外国哲学，必不能植根于民族的土壤而存活生长。于是他们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相嫁接、相融合的工作，并逐步取得了成功。在这一工作中，毛泽东起的作用最大。正是他明确地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从孔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他本人就熟悉孔孟老庄、程朱陆王，在他的哲学著作或讲演中常常引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在整个形态上也是中国化的。在当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是一种有浓烈的中国传统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许多范畴或命题已经成了大众日常生活的语言。如“实事求是”，“一分为二”，“物极必反”，“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等等。

三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前，中国的哲学状况有两个明显的缺点。一个缺点是，与中国传统哲学相融合的做法未能一贯坚持并深入下去，到后来盲目的反传统的倾向又出现了（“批孔”是达到了高峰的表现），这为中国人所不能接受。另一个缺点是对西方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现代西方哲学未能吸收融汇，用以丰富中国哲学的内容。中国并非没有西方哲学的专家，国家研究规划里和大学的课堂里也非没有西方哲学的地位。问题在于没有认真去找西方哲

学与中国哲学的契合点,没有把西方哲学作为人类文明的成果从中吸取智慧,西方哲学中反映人类共同认识成果的优秀部分在中国影响甚微。这两个缺点限制了中国哲学的丰富性和时代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提出实现现代化目标的十几年来,经济、政治和文化都开始发生巨大的变化。人们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柱和为人处世的方法需要有哲学理论的指引。原有的哲学状况已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西方哲学较多地进入了中国。目前中国哲学界可以说是各种流派纷纷出现,出现了“多元”的现象。中国哲学又一次经受国际哲学大潮的冲击,其意义是非常积极的,因为它可以克服中国哲学近几十年相对封闭的弱点。一个民族的哲学如果不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大道接轨,只能走向褊狭和枯萎;当然,这种精神产品如果失去了民族的特色,也不可能对世界文明的宝库作出贡献。

在当前这种“多元”的现象是一种过渡现象。一个民族在任何时期当然都会有多种流派并存,但是在一定的时期必有主流,必有共同的哲学精神,这往往要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激荡和融汇,孕育和生长才能水到渠成。这种主流和共同精神必定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当前的中国哲学正处在新的不成熟阶段。它的不成熟表现在许多方面,我认为比较显著的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继续坚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们对国际的、特别是西方的哲学的了解、吸收还很不足。另一方面是某些积极引进西方哲学的人们又对中国传统哲学、包括对已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继续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采取全盘否定的轻率态度,正在犯前人犯过的错误。但是,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哲学自身发展的规律必将缓慢而顽强地纠正人们的偏颇。中国思想界必将把中国传统哲学中一切合理的成分和世界哲学中一切合理的成分融为一体,在走向现代化的中国土壤上形成自己的哲学,使之成为民族的灵魂。这种哲学将既是民族的,又是世界的。这一过程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但是这种哲学的必然出现则是可以预期的。

(责任编辑 严真)